同唐甄语

杨村

《潜书》是一本充满文学色彩和政治哲学思想的书,乃唐甄所著。唐甄,我按照他在书中的自称,叫他“唐子”。虽是五短身材,又丑又聋,一生只做过十个月的长子知县,却才大文韬,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可是,唐子虽仁慈宽宥,却是一文辞刻薄之人,说话绝,不留情面。在《室语》中,吃鱼就吃鱼,干嘛还要牵扯到盗贼?而且说:“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为贼也。”在《尊孟》里也说“世无圣人”,在《性才》里又说“善治天下者未之闻”,这不是严重犯上吗?不过他接着举了汉高帝、光武帝等一众,把大将杀人、偏将杀人、士兵杀人、官吏杀人,都归罪于天子,言之凿凿,至今尚无人辩驳。

由此,日读《潜书》数目,发乎其思,思之随录。故有《同唐甄语》多则,兹择录于斯。

1.唐甄云:“圣人之心如岳,众人之心如海。善居心者,能使海变为山,则尧孔可几也。”意思是说,圣人的心境就像嵩山沉静,大众的心境有如海水动荡。善于让心入定,就可以把浮泛的心境变得像山一样稳实。如此,就接近尧和孔子了。

我语之唐子云:“善哉斯言!”

在这缤纷的津城,我得把浮泛的心沉静下来了。

唐子有许多话,说得是合情合理的。

比如他说:“彼市里少年、妇人、小子行诈以欺人,皆兵法也。”

他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

他又说:“治世十一二,乱世十八九。”

可是,唐子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就还是带着旧时代的头脑。有个叫方子的朋友问他,你在长子县当县令当得怎么样?唐子居然回答说:“四境如我墙垣,土田如我园圃,道路桥梁如我户庭,庐舍如我屋宇,蓄积如我仓廪,男女如我妇子。如斯而已。”

我以为,这个回答很有问题。这不就是《诗经》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么?这不就还是“家天下”思想嘛。要是从国家就像我的家一样,百姓就像我家的妇人孩子一样,我必须像爱惜自己的家和爱护自己的家人一样爱他们,似乎问题不大。关键是百姓早已是自由的个体,他们不是你唐子的财产,他们的庐舍也不是你家的房子,他们的蓄积更不是你家的仓库,他们都是受到法律保护,而不是你唐子一个人能保护他们呀。何况你自己才说“治世十一二,乱世十八九”呢?

唐子在长子做县令,也只不过做了不到一年啊。他就找到做天子的感觉了。

如果百姓不是自由的个体,其利益又不受法律保护,天子也不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而只是一个仓库,那真就是灭顶之灾。

杨村谓之唐子云:“你们旧时代人做官,总是想当老爷;我们现代人做官,却个个想当公仆啊!”

唐子笑而不言。

2.我说过,唐子讲的一些话很有道理。但是,唐子讲的一些话也很值得怀疑、商榷。

唐子说:“夫天高地下,夫尊妻卑。”又说,“盖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

杨村叹曰:“唐子有对,也有所不对啊。”

天地有上下,男女无尊卑,才是正常的态度。而把丈夫处在妻子之下,就说丈夫放下架子屈尊于妇,都归功于丈夫有美德。那就是错误的。唐子不应该仅用道德来衡量这个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思想问题、观念问题。

当然,唐子是一个很尊重妻子的丈夫,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并不严重。他认识事物的不足,主要在于劝世的工具不周全。唐子虽说“世无圣人”,却一味用道德标准去要求天子、臣子、丈夫,这哪里可行呢?一味用褒尧舜而贬桀纣来讨论救世良方,怎么可行呢?这个世界,假如要乾坤自处、男女平等、个体自由,而不乱套,除了弘扬道德,就还得遵守法度。而且,那法度又必须是良法,而不能是恶法啊!

我说唐子是好丈夫,尊重女性,不是凭空乱说。汪撰说:“吾之交友亦多矣,处室数十年,无变色疾声者,惟见先生与城西刘子,其他则暴其妻不如待其仆者,亦数见之矣。”此其一。唐子膝下无子,仅养女儿,信誓终守,而不暴妻。此其二也。

可能你们会问:“汪撰是谁?”

杨村说:“就是唐子的一个朋友啊。”

你们要问:“刘子是谁?”

我也不认识。

3.孟子有一句话很有名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每次想起总觉得好笑,怪不得现在的人喜欢拿他来开玩笑。如似一个人想移居国外,却没有经济能力,就自嘲道:“贫贱不能移。”搞不搞笑啊?

在孟子的时代,这样鞭策朋友,教化天下,也可能不是说大话、唱高调。只是后来的人,因为功利濡染,崇富轻贫,富贵而不能淫者,贫贱而不能移者几人?至于在权贵威压之下不能屈服者,寥若晨星。

在这一点上,唐子确实颠覆了孟子。

唐子说:“节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众,岂不重乎!”

唐子是说,一个人能不能保持节操,要看他有没有足够的食物。食物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这就有点与圣人唱反调的嫌疑。那次我与达子谈论潜子,说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也是吃饱了撑的。潜子虽非富贵,但家有田圃,尚能果腹。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愁杀白头翁”才怪。

达子曾云之余:“要自信啊哥。”

杨村说:“达子,我明白了。自信,首先要有自信的底气啊。”

可是,我哪来的底气呢?

4.唐子说:“文示之不信于民也久矣。”我曾经批评唐子淡于法度。其实不然。唐子也谈到法律法令的重要性。我只是说,他过于偏德治了。唐子认为,德之在君,天下治;德之在府,府治;德之在州,州治;德之在县,县治。我则以为,君、知府、知州、知县,均为人也,非与常人殊异。唐子云:“天子虽尊,亦人也。”既是人皆如一,则无不生七情六欲,以德治之,实乃伪之。唯以法治,方可制其情,束其欲。由是,天下治之,府治之,州治之,县亦治之也。

我也不是说,有法而弃德。我只是说,德是个人的修行,治天下确实需要有贤德的人,故当代人尝云:“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唐子其实称不上政治家,他只能是一个政治观察家。因为唐子一生只在长子县做过十个月知县,一谈富民,他也只会列举他在长子动员老百姓种桑致富的事情。他动员老百姓种桑养蚕,身边的人建议他,要向全县发一个文告。唐子不喜欢那一套,于是说出了上面那句话:“文示之不信于民久矣!”我是很欣赏唐子这句话的。因为,我退休之前,也常常听上面的人说,要杜绝文山会海。只是为了杜绝文山会海,又下了无数个文件,开了无数次会。杜绝文山会海又成了文山会海。

说岔了。我说唐子只做了十个月的长子县知县,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呢?而且,当时长子只是一个小县、穷县。唐子在十个月里,压根就不谙政治的水有多深啊。

昨天有人问我:“唐子为什么只做了十个月的知县呢?”

杨村回答:“因为唐子在任上对服刑的人比较宽仁,而且有犯人越狱逃跑了,要问责啊。”

又问:“那时为什么叫知县?”

杨村笑说:“知即是主持、主管呀,知县就是主持和管理一个县的全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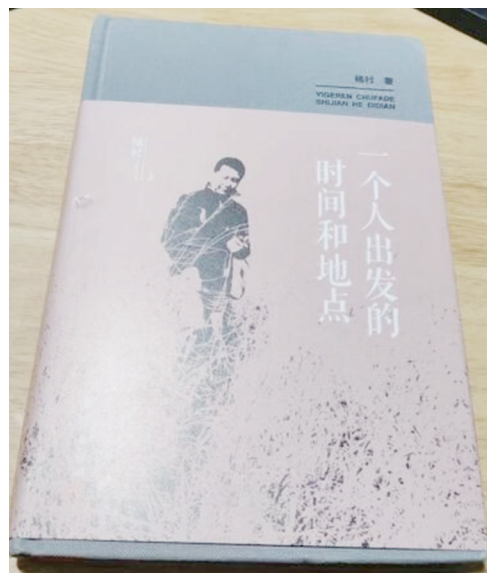
依此,其上的知州、知府,都是这个意思。

5.唐子在《远谏》一文里,主要谈亡国之痛与亡国的责任。他先前谈亡国的十个原因,我就不想全部重复了。但有三条,我记住了,大致这样说:“百姓困穷,司牧不知,知而不为之所,国亡;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金粟殚竭,不足以厚禄食,养战士,国亡。”意思是,百姓穷困,当官的却不了解,了解也不安抚救济;官员们逐利贪腐而不知羞耻;国库耗尽,没有钱来供养官员和军队,都是国亡的原因。

我对唐子说:“这些道理皇帝懂啊,主要是看皇帝愿不愿意纠正罢了。”

唐子又把话题扯到亡国后,皇帝、臣子、宦官、百姓的命运。他说,虽然大家都惨,但是皇帝最惨啊。

我问:“惨到什么程度呢?”



唐子说:“求为道路之乞人而不得也,欲与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意思是说,惨到想在路上当一个乞丐,想跟老婆孩子相依为命苟延残喘都办不到。

开始我不信唐子。三百年后,阿萨德·巴沙尔的命运证实了唐子的说法。说是阿萨德被赶下台后,卷走一千三百五十亿美金,逃到莫斯科,他的老婆就找他闹离婚了。未久,又被人暗中下毒,命悬一线。不过,我还是对唐子的话心生疑窦,人家有一千多亿美金啊,怎么会比老百姓还惨呢?

由此,唐子说:“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乱,非臣能乱之也。”实有道理。

唐子又说:“治乱在君,于臣何有!”

听到这里,我就有一点想法了。怎么把乱全推给皇上呢?你做臣子,拿着那么多厚禄,日夜考虑的是如何辅助皇上治理国家,现在倒好,你一拍屁股就没有责任,岂有此理!

杨村肃然曰:“非也,乱,在君,亦在臣。”

我又对着唐子耳朵悄悄说,你唐子不就一布衣也,充其量做过一个穷县的十个月的知县,你对治世和乱世,操那么多心干嘛?反正人家又不叫你做臣子。你就是做了臣子,美女金钱也不一定打不动你呀。

唐子就不说什么了。

6.喜欢谈论治国理政的唐子,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因为无法登上朝廷,所以看不清国家的典章,无法对治国之道讲得特别详细。作为匹夫匹妇一众,杨村觉得唐子已经想得非常周到,讲得十分完美了。不过,我仍时与唐子较劲,每每抵牾。

唐子说:“官多,则禄不得不薄;禄薄,则侵上而虐下,为盗臣,为民贼。”

从唐子的主张来看,首先要借鉴盛世之治,而不可重蹈衰亡时代的覆辙。盛世之治的一个良方,乃为精官简政。只有精官简政,才有钱来厚其禄,使之不为盗臣,不为国贼。要不,从上到下养冗员而不干正事,则祸国殃民。这是很正确的。故唐子把时代之弊归因于不法盛世而袭衰世,曰:“不法先王而袭衰世之制,奈何至于今无正之者!”

我以为,唐子实际上只看到了一面,然后以一己之善念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只注重了德治而淡于法治。

当今天下,官是否已过剩,吾未知情也。然就高官而言,禄不可说不丰,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是,为何还贪腐如若洪水,败坏犹同猛兽耶?归根结底,就是人心不足。身居高位,仍视高高位而谋之;已领厚禄,仍为厚厚禄而取之也。是故德归于德,乃个体之修为,没有制约的底线;而法之为法,则可绳而治之焉。唐子本人也有明察,他说人的道德有三种境界,最高境界是坚持道义而不顾及利益,其次是有利益就守道义,最次是得到利益也不讲道义。即“有义无利、见利思义和见利忘义”三种境界。第一种人,我未曾见过啊。

由是,杨村对唐子说:“你说的话只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啊。”

唐子微颔其首,曰:“兽哉,汝无若亦论《省官》也?”

我红脸面对唐子。因为我也是一知半解。官场里面的问题,我哪晓得那么多啊!

这时,跨年的钟声刚刚响过,我掀动窗纱,仰望星空。唐子何为耶?亦颂欢乐,匹夫匹妇皆乐也!

7.杨村以为,唐子早已是古人了。可是唐子却说“古人多实,今人多妄”,说“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诈”。如此,诈行早在唐子时代就盛行了。唐子视之前人曰古,吾视之唐子曰古,后人视之我曰古,诈行是不是也一代胜似一代耶?

今早看学者周大伟的视频。他说一七七六年,地球上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美国宣布独立;第二件事是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第三件事是英国人瓦特发明和改造的蒸汽机开始用于船舶动力;第四件事是乾隆皇帝下令焚书七十多万册种,维护了满清统治。一七七六年发生的事情,唐子当然不可预测。那时,唐子已经作古七十五年了。我也难以判断,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诈为是否有关。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与人的思想是必然有关的。这些事件也暗示着不同文明的发展走向,东西方确实是有差异的。真与诈,东西方是不是一样呢?

诶呀,话题又扯偏了。唐子口口声声说古人的好话,不外乎也只是不厌其烦地罗列尧呀舜呀伊尹呀皋陶呀伯夷呀这些圣贤。他断定“古人多直今人多诈”,是因为他的眼光可能过多地停留在当世。世象多诈,就看不顺眼;看不顺眼,就担心国家没有举贤用能的途径,忧国忧民起来,我怎么不理解呢?

唐子曰:“世尚道学,则为儒者;世尚文辞,则为名士;世尚气节,则为直士;世尚功业,则为才士。惟其所为,言貌皆真;营营往来,籍籍聚会,以图进取,孰能辨之?”人们都在看上面的脸色行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就装模作样地装成什么样的人。“悦于上官,悦于大臣”,时下把这些行为叫“演”。如果是高层人物,而且演得乱真,则叫“影帝”。

孟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诈为盛行,则难辨真伪,举贤荐能就难了。我所在的那个小县,知县大会小会上都说:“当官发财两条线,想做官就甭想发财,想发财就甭想做官,对贪腐行为必须零容忍。”岂料,未过半年,该知县就因贪腐锒铛入狱。此乃影帝也。影帝众则演员益众矣。

我只能说,唐子于世事的洞察甚明。若与我共世并生,其眼光一定更加锐利,其言辞当愈犀利了。

在这件事上,我面对唐子,无话可说。

8.唐子写的《潜书》,大多讨论为学与治国理政。不过有时也讨论讨论兵法,讨论讨论养生,讨论讨论生死,讨论讨论乡风民俗,特别是那种丑俗恶习。但讨论为学、兵法、养生、生死、风俗,也总会引申出治国的道理。

我先前做过一文,名曰《萧萧墓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还送审了的。自以为我写的墓葬稀奇。今读唐子《吴弊》一文,原来还有更稀奇的。

唐子云:“吴人发冢,非异人,即其子孙也。”

听说过盗墓的,没听说过自己盗自己祖先墓的。可是吴地却盛行此道,做起祖宗的掘墓人来理直气壮。既可卖陪葬的金玉珠宝,又可卖祖宗的风水宝地。由是,可以大发一回祖先之财。

而更甚者还有,某要状告自己的叔叔,又苦于没有理由,只好让嫂妇诬其叔叔奸污她。嫂妇不从,婆婆和丈夫就往死里打。于是终于把叔叔告上官府,等待判决。又一个则想把自己痛恨的人搞死,却惧于杀人偿命。他索性叫朋友约来此人,准备先砍下该痛恨者脑袋,再砍下嫂妇脑袋,然后提着两颗脑袋告官,说是该男私通他的嫂妇,捉奸拿双。幸亏嫂妇暗中窃听到丈夫的密谋,逃跑了。

这实在是极其恶毒的乡弊啊。

杨村问唐子:“这么狠毒的流弊,四方八邻怎么容忍得下呢?”

唐子却一点也没有吃惊,显得平静极了。说是吴地的人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唐子说:“吴中之人,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

哎,那是三百年前的事了,当下应该没有了吧。如果有,也早该被绳之以法。可惜唐子没有长生不老之药,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这个花天酒地的英明盛世!

要是没有了法律,任其恶弊流演,说不定有一天,他们就做了祖宗的掘墓人。祖宗的墓掘完,然后又做起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有可能的呀。

山水岂无灵

冉正万

十八岁离开余庆,离开乌江边上那个偏远落寞的乡间坝子,却又感觉从未离开,不仅仅因为亲人还在那里,也因为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在心头刻下密纹,不用检索,不用翻阅,它们会自动跑出来抚慰心灵,对受伤的心灵进行清理和修补,并以此为原点,逐渐扩大关注圈层,从关注乡间坝子里的一切到关注乡镇里的一切,从乡镇里的一切到整个黔北的一切,从黔北的一切到贵州的一切。哪有一切,行文方便而已。

这一切中最核心的是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他们大多是农民,我对他们的熟悉程度超过他们自己。死去的人在我的小说里活过来,活着的人还在我的小说里活着。文化人并非没有,只是比较少,了解他们远比了解农民困难,知识教会他们如何隐身。最近几年,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的故事不如其他身份的人精彩,但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意义更大。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龙家小学的创始人李光斗,一位活跃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余庆籍诗人、散文家,民国《余庆县志》编纂者。

我不止一次在写作中引用李光斗先生的诗文,对他的名字却很少提及。因为小说创作要避免引文繁琐。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白毫光》,最后一段再次引用了他。“写这本书的人每次回老家上坟,都会顺便拐上山给韩先生烧灶香,化几张纸钱。他不相信韩先生能得到他敬献的香和纸,但他非常喜欢韩先生墓碑上的对联:老境逼人,尘世光阴留几许;浮生若梦,夜台鼾睡醒何时。”烧香化纸确实做过,不过小说中的韩先生不是李光斗,只是用了他生前为自己生圹亲自撰写的联语而已。在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两座桥》中,我行文不再避讳,直接以李光斗作小说人物名,并且极力想把这位晚清拔贡呈现给读者,借李光斗指认历代乡绅对乡土中国的塑造和意义。这种塑造已不再有,无疑是乡土中国巨大的损失。不过,光斗先生若读了这篇小说,一定会说:

“小子,你写的不是我。”

也惭愧,也心虚。似可辩解,亦无须赘言。确实如此,作者对人物的叙述是作者对人物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主观的,甚至是一鳞半爪的。写作者无法描述人物全貌,至少不可能是人物的全部。我所理解的李光斗与真实的李光斗之间的距离,恰恰是写作的乐趣。以句子架桥,一步步走到虚构的人物面前,其实是走到自己面前。

李光斗原名李梦星,号筱庚,咸丰五年生于龙场(龙家坝,现龙家镇),民国二十二年去世。宣统三年被委以四川涪州知州,因辛亥革命爆发未到任,同年与友人在龙场创办初、高两级学堂,自任堂长。民国十六年,两级学堂分开,高级学堂迁到赦溪,初级学堂留在原地,是为今日龙家小学前身。这是余庆境内现代教育之始,国文之外开设历史、算术等课程,光斗先生功不可没。

我知道李光斗这个名字时只有八岁。正月里,去先锋给亲戚拜年。一个人去看先锋桥,看见桥头石壁上有字,当时大为惊讶,隐约感觉石壁上的字与石碑上的字大不相同。故乡文化并不发达,人们一生精力耗费在吃穿住用上,很少有人提笔写诗。我已上小学三年级,用手指肚把石壁上的字摸了一遍,认得的字极少,但它们的神性深深地打动了我。别的孩子最感兴趣的是挂在桥下的宝剑,我却喜欢石壁上的字。回家告诉母亲,她说那是李先生写的。具体内容她也不知道。她在这里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对李先生敬慕有加,石壁上的内容却没认真去读过。她没见过李先生,李先生去世第二年她才出生,在街上摆摊卖布的外公不时说起,让她知道李先生很了不起。记忆最深的故事,是李先生割肉给父亲做药引子。先生的父亲常年生病,他效仿古人割股疗亲,期望父亲彻底痊愈。母亲赞叹李先生的孝道时我在想,她和父亲生病,我要不要割肉给他们?结论是可以不割,应该多赚钱,送他们看最好的医生。父母真生病时,我根本没法请最好的医生,只能带他们去普通医院看病。

李先生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拔贡。拔贡是清代选拔人才的制度,清初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祖父和父亲都没做过官,李光斗被任命知州,应是通过了朝考。直隶知州相当于知府,涪州知州相当于知县。世事难料,刚接到任命就爆发辛亥革命,李光斗未能赴任。

李先生没能做官,但他依然是个文化人。文化人自然有文化人的活法,教书育人,参与地方性事务,写诗作文,编写地方志,一天天从未空过。光绪十一年,先生以自己教私塾所积银两,襄助修建八仙桥,是当年乌江以北最大的一座桥,时称巨桥。

地名当时叫杨先锋,桥叫八仙桥;现在地名叫先锋,桥叫先锋桥。在某支军队担任过先锋的杨姓军人何时落脚于此已不可考。以人名作地名,亦见当年之洪荒。石壁上的诗文,我在《贵州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里第一次读到全部内容,《咏杨先锋八仙桥》二题——

其一:

仙锋山下水东流,一线虹拖浪影浮。气接余湄通鸟道,诗成风雪话驴头。受书景仰兴王佐,题柱盱衡壮士游。吾忆当年司事者,偶来凭眺数春秋。

其二:

万山丛杂一溪横,雁齿排空两岸平。春水不忧人灭顶,银河浑渡鹊无声。气凌霄汉犹龙卧,迹印寒霜快马行。三十年前诸父老,关怀利济福苍生。

“受书景仰兴王佐,题柱盱衡壮士游”用了两个典故。受书乃“张良受书”:有一天,张良慢悠悠走在下邳一座桥上,一个老者走过来,故意将鞋丢到桥下,叫张良给他捡上来。张良很吃惊,想揍他,又觉得人家年纪大,忍气吞声把鞋捡上来。老者抬起脚叫他穿上。捡都捡上来了,穿就穿呗。老者穿上鞋后大笑而去。张良觉得怪异,紧紧地看着老者背影。老者走了一阵倒回来,对张良说,你还行,五天之后来这里见我。张良五天后来到桥上,老者早就到了,斥责张良不尊重老人,比老人还来得晚。又过了五天,张良鸡刚叫就来到桥上,老者还是比他先到。又过了五天,张良半夜就来等老者。老者来到后,给了他一卷书,说你呀,读了这卷书可以给帝王当老师呢。张良辅佐刘邦,果然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题柱”则是司马相如的故事:当年,司马相如离开成都去长安,在城北升仙桥桥柱上题写“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我司马相如求不到功名,就再也不回来了。盱衡是睁大眼睛看。光斗先生之意是建功立业,是“兴王佐”。我对以羞辱的方式试探一个人是否值得传授秘籍颇不以为然,相似的故事却非常多。

先生一生作有大量诗文,可惜地处偏远,未能广泛传播。其诗与文少部分吟咏家乡风貌,大部分是实写,与他参与的事务有关。八仙桥是他参与修建的三座拱桥之一。这座桥连通余庆、湄潭两县驿道,让思南、风冈、余庆北部的人上贵阳近了四五十里。先生和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一样,修桥、办学是自发的,这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和文化。由有功名的人倡议,乡绅、财主才会踊跃捐款。

李光斗的朋友、印江人周兆熊在先生的生圹石柱上写下“李君筱庚先生,龙场硕儒,经史外旁及地理星辰之学,是能得个中三昧者”等语。可见先生兴趣并不止于读书赶考,还想窥探宇宙秘密。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以为老家山水没什么灵气,几百年来未出现什么“人物”。那些出现在书籍里,口头文学里的人物都在别处。从理性上,我当然知道与这片土地开化迟,教育落后有关。康熙五十五年,时任贵州布政使的白潢感叹:“盖以重山密箐,惟苗狆是见,柳子厚以为非人所居。”余庆于万历年间设县,至今不过四百余年。设县之初,据《余庆县志》(陈志)所述,“余庆地瘠民贫,兼之苗、汉杂处,声教不通,虽旧设白泥、余庆两土司辖制,然俱为播州属地,自应龙叛乱后,人民日渐贫弱。”看了这些记载,更觉得余庆落后,开化太迟。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或许和我自卑的天性有关。当我在夜阑人静时思考这件事,发现不完全是自卑,还与自己对这片土地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有关。敖溪与龙家两个镇相距五公里,时分时合,隶属关系也多次变化。余庆设县迟,这只是行政管理上的问题,早在唐僖宗乾符二年,就有平定播州有功之臣毛若霖入黔并在敖溪定居。类似的外来者给这片土地注入新风。在整个清朝两百七十六年中,余庆有功名者三百余人,其中进士六人。由于设县比较迟,这些数据要在其他方志上才能看到。

李先生研究星辰地理,与我的狭隘思维大不相同。“受书景仰兴王佐,题柱盱衡壮士游”表达的是家国情怀。并且先生明确表示:“山水岂无灵,天地生成人偶得。”这一句刻在先生的墓柱上。他在生前为自己修好生圹,和朋友一起撰写了墓柱上的联语和附注。他朋友写的是:“两地订知音,结文字因缘,晨夕聚谈诗律细;一丘藏伟骨,有鬼神呵护,江山都为福人留。”生圹修好后二十五年,先生才去世。

事实证明,不是山川有没有灵气,而是教育付出的多寡和方法。在一些聚会上,对余庆多少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提及梅宏院士。以梅宏今日成就,确实足以让余庆人自豪。不过“余庆人厉害,聪明、好学。”这话听着舒服,我却不敢承认,我一直以笨出名。梅宏当然是聪明好学的。他在余庆上高中时,我在敖溪上初中,其父梅应林是敖溪中学校长。不知多少次,我看见胖胖的梅校长坐在门前藤椅里,表情严肃,两个儿子(梅宏和他弟梅炯)站在他面前背英语。我不但不羡慕,还暗自得意:他们好辛苦哦,而我好安逸好自由。

《镜花缘》有句:“古人云‘人杰地灵’,人不杰,地安得灵。”

梅校长不仅培育了两个优秀儿子,他任敖溪中学校长期间,高考成绩也可以和县一中比肩,而生源和师资,是一中挑剩后留给敖中的。他洪亮略尖的嗓门让人至今难忘。偶尔代一节物理课,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不是因为威望,而是确实讲得好。

昨天是今天的序,今天是明天的序,明天是未来的序。从“刀耕火种之俗渐知农桑”到“茔门椎髻之人颇晓诵读”,确实漫长。至今不仅有梅宏院士,亦有各行各业佼佼者。

每次回去,无论走哪条路,只要进入余庆县,情绪会莫名高涨。那种轻松愉快是游子返乡,是就要回到母亲身旁。层山叠叠,很多山都没上去过,却并不觉得陌生。这些山不险峻,却很高大,只要愿意,肯定可以爬上去。有些山坡上还有住户,甚至还是亲戚。以前走山路,现在公路已能去任何一户人家。高山上的姑爹姑妈已去世,他们家小米鲊的香甜、腊肉的咸香还在舌尖回旋。李光斗于一九一一年创办的龙家小学还在,梅校长曾经任职的中学也在。两个学校的毕业生已有几十万人,虽然多数人毕业后没能进一步深造,只能在家务农,但本科、硕士、博士也有不少,并且遍及国内外。

山川灵气藏在何处?是山岚?是青山绿水?是山巅上的白云?那些住在沙漠里的人,一样感觉山川有灵呀。那么,应是情感,是感恩,是感怀。天地生成人偶得,情感越深,灵气越足。江山胜意,并非具象回馈,而是要靠智慧、天赋、激情识性明悟,以及本方本土自开化以来,读书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他们的努力不单是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也让山水之灵有了载体,让山川之灵得以显现,从而也改变了人本身。